

# 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

## Research Review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李小尉 朱汉国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社会史,本是社会史研究范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却未跟上社会史前进的脚步,在理论探讨、问题意识、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等方面,都与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研究存在着较大差距。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善。从当代社会史的理论探讨、具体研究状况、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三个方面,对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作一学术总结。

**关键词** 当代 社会史 研究现状 发展趋势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Li Xiaowei Zhu Hanguo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However, for various reasons, it hasn't kept up with the pace of progress of social history for a long time. There's a huge gap betwee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 modern social history i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problem awareness, research path and method.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situation was gradually improved. This paper is an academic summar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on the aspects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the specific research situati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situation, development trend

改革开放以来走向复兴的中国社会史,已俨然发展成史学领域中的一门显学,成果极其丰富。然而,不同时段的社会史研究状况并不平衡,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则起步较晚。无论是在理论探讨方面,还是在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等方面,都和社会史的整体研究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善,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突出的表现是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选题日益丰富,研究视角不断拓宽,而且研究的方法、观点都与时俱进。在此,就近年来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的主要研究作一总结,并对目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思考。

### 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探讨

有关社会史研究的相关理论探讨,一直是社会史研究领域较为活跃、被学人广为关注的选题。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有关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文章有600余篇,仅2010年就发表文章54篇。其内容涵盖了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研究方法的革新,对研究状况的反思、未来发展的展望,乃至对研究内容的总结等。可以说,社会史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并逐渐形成多学科、多角度的学术对话。

\*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但是,在蓬勃发展的社会史理论探讨视野中,也存在着“区域失衡”现象。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史理论思考,多集中于中国古代社会史与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鲜有结合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而进行的理论探讨。虽然偶有学者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但理论探讨仍然仅仅局限于“呼吁与倡导”阶段,很少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特点,对当代社会史研究进行的问题讨论、学术史反思以及全面的总结。田居俭全面阐释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从上下两个视角来构建当代社会史研究体系的独到见解<sup>[1]</sup>。姚力则提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应该以国史重大问题为主线展开,同时要抓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和心理情绪三条线索,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相结合,从而达到总结当代历史、揭示当代社会发展原因与动力的目的<sup>[2]</sup>。

应该说,此类构想并没有跳出国史研究的框架,也没有改变国史研究中按照宏大叙事的线索模式。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是否应当按照国史的框架主线来展开?如果按照国史中的重大问题为线索,是否会导致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仍然限于“新瓶装旧酒”,这也是需要继续深思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行龙提出,“把社会史研究引入中国现当代史”。他多次强调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延伸到现当代史的必要性<sup>[3]</sup>,并提出“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这“也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担负的一份社会责任”。同时,行龙在社会史的研究实践方面也重视在当代史领域的开拓,他主持的课题“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研究”,就是从社会史视角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崭新尝试。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探讨并没有多少回应,尚未形成预期的学术探讨与思维碰撞。

简而言之,中国当代社会史虽有学者在不同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但是其理论探讨却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 二、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状况

目前,在社会史研究者的学术反思中,常常把30年来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发展过程,归纳为几个阶段,即最初的“整体社会史”,发展到“区域社会史”的繁盛,再到最近几年的“新社会史”的倡导与实践。这一简约的概括,基本勾勒了中国社会史30年来前进发展的阶段历程。比较之下,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虽然起

步较晚,没有随着社会史发展的总体步伐而前进,但目前的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似乎也在经历着同样的成长历程。

### (一)整体社会史与当代史学

整体社会史是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史学界虽然对社会史的理解与认识不同,但彼此之间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历史或整体的历史。由此,以往不在传统史学研究视野之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礼俗、救济救灾等选题均登堂入室,成为史学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这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也体现。例如,土地改革运动一直是当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断推陈出新的领域。王瑞芳从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入手,考察土改运动前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的显著变化,而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对我们党的阶级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sup>[4]</sup>。这一研究,展现的就是对农村社会变迁进行整体考察的研究路径,从该研究中体现出的也是作者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整体性关怀。

此外,学者们还以某一社会组织或群体为研究对象,展现其背后的社会变迁。唐明勇通过梳理农民协会在20世纪50年代的盛衰之路,分析了农民协会由出现、到兴盛,以致经历辉煌之后转而隐退的深层次原因<sup>[5]</sup>。崔跃峰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街头摊贩为研究视角,指出摊联会筹委会的建立完善了政府对摊商的控制机制,开辟了两者之间的信息渠道<sup>[6]</sup>。吴愈晓考察了农村中的精英群体,检验了1978~1996年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sup>[7]</sup>。诸如此类的当代社会史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可以看出,在“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带动下,传统的国史研究中被忽略、被遗忘的专题领域也开始佳作迭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 (二)区域社会史与当代史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思想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界掀起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浪潮。一方面,社会史学者的研究目光开始转向社会史的区域研究,关于这一内容成果非常丰富。另一方面,社会史研究中兴起了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结合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对社会史进行问题重构与全新解答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人对华南地区的宗族研究,以及赵世瑜教授对华北地区的民间信仰研究等。

社会史在大量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之后,将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从而更真切地感受历史“现场”,形成对历史的“问题意识”,以“同情之理解”的心态重新诠释历史,最终构建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在区域社会史发展的影响下,近几年来当代社会史也涌现出用“区域社会”、“国家与社会互动”等理论,以及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对土地改革问题的重新挖掘,揭示土地改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李里峰通过对山东、河北等省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材料发掘,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指出,土地改革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外,他通过对土地改革中广泛发动农民展开“诉苦”这一过程中特定形式的剖析,分析了国家对民众进行动员的实施效果<sup>[9]</sup>。张一平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苏南为中心的新区土地改革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在新区土地改革中体现的是村庄动员与社会分层<sup>[10]</sup>。李巧宁则以陕南土地改革为例,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山区土地改革中的国家政策、地方实施与群众互动结合起来,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深层社会原因<sup>[11]</sup>。

2.通过个人或群体来展示当代社会中复杂的社会关系

行龙的《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通过劳动模范李顺达从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三个历史时段的个人生活变迁史,揭示了在中国革命和生产建设中个体、村庄、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sup>[12]</sup>。陈德军的《声望、人缘与地缘——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省主席为考察中心》提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央在任命各地省(区)主席(主任)时,也尽可能充分地运用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声望、人缘与地缘,以使人民政权的施政意志在新旧鼎革之际更为广泛深入地抵达全国各地<sup>[13]</sup>。

3.通过婚姻家庭与女性地位的变迁,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面貌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婚姻家庭与妇女地位方面尤其表现明显。李洪河以中南区为例,考察了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施行后,婚姻法宣传对当地民众实际婚姻生活的影响<sup>[14]</sup>。高小贤选择20世纪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举办的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为例,分析该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并阐明国家的经济

政策如何同妇女解放策略交织在一起<sup>[15]</sup>。金一虹通过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sup>[16]</sup>。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政权对妇女解放的大力提倡,在舆论中女性地位一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是否女性走出家庭和男性同工同酬就代表女性摆脱了羁绊,彻底走上了妇女解放的道路呢?可以看出,这也是家庭婚姻与女性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4.通过社会生活的某一问题来展现某一历史时期的面貌

都市文化是社会生活史研究中的一个永恒话题。都市文化与大众心理、社会风尚、文化传统等多项内容都有联系,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周武对革命文化与都市文化的衍变及二者互为影响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1949年以后,革命文化借助国家力量,迅速地从一个局部的、边缘的、地区性的文化变为统领全国的主流文化。革命文化由农村到城市,与都市文化相遇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互动与消长、抗拒与变迁,以其复杂多态牵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变迁<sup>[17]</sup>。美国学者Wilson Verity对1911~1976年中国夫妇的衣着服饰特点进行了分析,他提出,衣着服饰不仅仅是社会风尚的外在表现,深层次的社会变迁往往也开始于最表层的生活层面,反过来说,民众生活中最普通的服饰变化,体现了社会的变迁,也体现了多种文化的交汇融合<sup>[18]</sup>。

5.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控制与保障的历史梳理,揭示国家政权与社会互动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区性的疾病防控工作成绩较为突出。以东北地区的鼠疫控制与防控为代表的卫生防疫事业,上海市对流行性天花的应对与治理情况等,都是社会改造中的重要内容。这不仅关系到民众的安全,也直接影响公共秩序。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城市中普遍推行的对城市游民、乞丐等的改造措施,已经有多位学者进行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卓有成效。高冬梅(2010)以河北省为例,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弱势群体得到政府救助的详情;韩勤英(2007)则对1949~1952年国家对于失业知识分子的救助进行了分析,并选取北京为研究区域,考察了此时期北京的贫民救济情况;李小尉(2007)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贫民生活救助、乞丐救助进行了深入考察。谢涛(2009)则以广州为例,具体考察了1949~1953年社会

救助体系的构建状况,并由点及面,对这一时期国家的救助体系进行了评析。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整理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范围广、救助方法多样,但是从长期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政府包揽救助领域,排除民间力量的参与,影响了救助力量的全面整合,削弱了救助的实效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地区性的公共卫生、疾病防控,还是城市中的社会改造问题、社会救助问题的研究,均已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目前的多数研究成果局限于对具体地区、具体事例的梳理上,鲜有横向比较和个案的深入挖掘。

### (三)新社会史、新革命史范式的探讨

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中国社会史在广泛吸收西方的多种理论概念的同时,也累积了比较扎实的学术基础,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史研究中影响愈来愈显著。但是,在社会史努力建立“多学科对话图景”之时,也有学者继续发扬社会史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不断提出种种学术反思,进行自我否定之否定,并提出“新社会史”、“新革命史”范式的探讨。

提出“新社会史”的代表学者是杨念群。其主要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史的未来发展要大力构建本土的“中层理论”,在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建立与中国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并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第二,提倡社会史的“区域研究”,并呼吁历史人类学的“在地化”感受要和其他阶层的感受世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sup>[19][20]</sup>。另一位代表学者孙江的观点则有所差异。他认为中国“新社会史”发展的关键,必须以清算自身的旧历史即放弃结构的整体史的叙述和正面回答后现代的挑战为起点,即放弃构建整体史的想法,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在不把文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的情况下接受后现代主义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建立起一套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sup>[21]</sup>。“新社会史”倡导者们虽然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其在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意义是一致的,即力图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开拓出更为广阔的解释空间。

“新革命史”这一概念,则是由李金铮针对目前中国史学界的“忽略重大历史课题而趋于枝微末节的‘碎化’现象”而提出的。其实,社会史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可以研究任何重大的、细微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按此理解,传统的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也可以将革

命与社会结合起来、用社会史方法进行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能将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引入中共革命史和国史领域,则传统的革命史学一定会焕发出新的光彩。李金铮的《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一文就是用社会史的视角透视革命史中民间借贷问题的“新革命史”的尝试。概而言之,相对于传统史学来说,社会史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如果将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引入到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中去,无疑会发现一片崭新的天空。

除了“新社会史”、“新革命史”之外,在其他的研究领域中国当代社会史也有长足的发展。例如医疗社会史,李德成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和推广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下,广泛培养了农村基层卫生人员,为缓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局面、提高农村居民对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作出卓越贡献。这甚至被一些国外专家赞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中国模式”<sup>[22]</sup>。王胜、刘英琴选取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以农业为主的平原小县——深泽县为个案进行微观研究,对集体化时期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效及促其兴衰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sup>[23]</sup>。张晓丽对20世纪50年代安徽淮河地区遭遇水灾后,各级各地政府对灾后的农村进行的医疗救助进行了考察,并揭示医疗救灾活动在社会救灾中的作用<sup>[24]</sup>。

环境社会史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又一引领学术发展的热点,“环境史的兴起,不但开辟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给史学带来了新思维”<sup>[25]</sup>。早期的环境史较为注重从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影响的角度来诠释。近年来,随着中西方环境史的交流与学习日益增多,环境史的研究开始朝向更加注重“社会环境”的角度发展。王先明提出,环境史的研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样重要,在学术研究中,理论研究应该结合客观现实,逐渐形成“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类社会历史这样的‘环境’话语”,从而展示人类社会生活演变进程的丰富性和多面性,并可以在人与环境、历史事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获取更为深刻、更具历史洞见的理性认知<sup>[26]</sup>。从这个角度来看,21世纪以来环境史的社会史发展取向,不仅体现了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时代呼唤。张连辉、赵凌云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观与人地关系的历史互动》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



府的环境观经历了从环境改造型、发展到环境保护型,再发展到生态文明型的两次转变过程。并通过分析环境观与人地关系的互动,对环境观的演变进行历史的考察,来探寻环境观演变的基本特征、规律及启示<sup>[7]</sup>。此外,赵英兰的“近代以来东北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也属于环境社会史。

### 三、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从以上研究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发展已经逐渐得到史学界重视,无论是选题的视角与方法,还是探究问题的宽度与广度,都是以往的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所未曾达到的。但是,不可回避的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目前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多局限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区域的、局部的,甚至短时段的历史考察,而缺少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时段的、纵向的全面研究。第二,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仍需要在中国当代史领域中进一步地推广。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发展,应广泛吸取中西方的社会史思想理论、研究视角与学术路径,形成当代社会史坚实的学术基础、科学的研究体系、丰富的资料储备与新颖的研究方法,从而在新世纪社会史整体的“多元发展”中,开拓出一片广袤天空。

### 参考文献

- [1]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 [2]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 [3]行龙:《“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 [4]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 [5]王瑞芳:《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 [6]唐明勇:《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民协会隐退的原因分析》,《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 [7]崔跃峰:《1949~1952年北京市摊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初探》,《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
- [8]吴愈晓:《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 [9]李里峰:《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 [10]张一平:《新区土改中的村庄动员与社会分层——以建国初期的苏南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 [11]李巧宁:《建国初期山区土改中的群众动员——以陕南土改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 [12]行龙:《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 [13]陈德军:《声望、人缘与地缘——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省主席为考察中心》,《史林》2009年第5期
- [14]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婚姻制度的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 [15]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 [16]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 [17]周武:《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以上海为中心》,《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 [18]Wilson Verity. Dressing for Leadership in China: Wives and Husband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s (1911~1976). Gender & History, vol.14, No.3.
- [19]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56页
- [20]杨念群:《“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 [21]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载《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2]李德成:《新中国前30年基层卫生人员培养模式探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 [23]王胜 刘英琴:《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
- [24]张晓丽:《20世纪50年代安徽水灾中医疗救助活动述论——以1954年淮河水灾为例》,《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
- [25]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载《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第16页
- [26]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 [27]张连辉 赵凌云:《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观与人地关系的历史互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